

鶴慶文史資料

第四輯



鹤庆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云南省鹤庆县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鹤庆文史资料 第四辑

大理州文化局准印证 (94) 28号

鹤庆县政协文史委 编

大理新华印刷厂 印刷

1092×787 1/32 字数14.7千

(内部资料)

编 辑： 李 森
编 务： 张孔相 刘永庆
李正芳 李灿荣

封面设计： 鲍 光

封面题字、印章篆刻：孙太初

3450/36

目 录

- 一、我所知道的策力读书社 蒋秉枢 (1)
- 二、滇西北的革命摇篮——鹤庆师范
..... 寸汝昌 王寿南(18)
- 三、我的母校 李群庆(31)
- 四、从鹤庆到昆明找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回顾 ...
..... 王北光(44)
- 五、红叶引来二月花 施吉川(50)
- 六、鑑湖小学和漾江合唱团 张锦钊(82)
- 七、第四政工队与北区二三事 段克强(87)
- 八、记原鹤庆县人民自卫第一大队 ... 唐强(93)
- 九、回忆保安团围攻王营小学 杨兴隆(102)
- 十、忆胡宗南残部在姜寅缴械投降
..... 杨兴隆(105)
- 十一、回忆《鹤庆人民日报》 杨定基(108)
- 十二、记新华书店代销处的成立
..... 杨定基(114)
- 十三、一九五一年鹤庆地震回忆
..... 潘寿山(117)

- 十四、怀念刘麟同志 黄坚(121)
- 十五、同学、挚友、同志——回忆苏盛
..... 周一卿(124)
- 十六、忆彭恕 杨苏(134)
- 十七、忆君窃火驱寒时,剑影刀光漠视之——怀
念彭恕同志 彭翔 段克强(145)
- 十八、忆戛子彭铮 彭国钧(158)
- 十九、不能忘却的纪念——缅怀彭铮同志
..... 陈力(160)
- 二十、振兴地方民族工业的杨穆之
..... 杨琰 杨璠(165)
- 二十一、李忍涛事略 李忍洁(170)
- 二十二、李宗黄事略 舒自志(177)
- 二十三、蒋宗汉与“马嘉理事件”
..... 李大成(185)
- 二十四、蒋宗汉捐修“万里长江第一桥”
..... 李大成(188)
- 二十五、建国前洞经会和圣谕堂在六合民间活动的
情况 杨加注(190)

附录：

一、王懋程遗作选 (194)

(1) 诗五首 (194)

(2) 古文字学提要歌 (195)

(3) 菩提寺碑记 (197)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鹤庆县第四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委员、政协机

关负责人 (199)

我所知道的策力读书社

蒋秉枢

《中共鹤庆县地下组织史料选编》一书的前言中写着：“30年代末，40年代初，很多革命书刊，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输入，给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革命青年成立了策力读书社等组织，学习和研究革命理论”。鹤庆县志的大事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39年县内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宗旨的秘密学生组织建立”。这些材料，把策力读书社在鹤庆革命斗争中的性质和地位作了肯定，但对其活动情况及作用并未详述。这些情况除读书社成员以及与他们较接近的人熟悉以外，知道的人很少，所以有必要作点详细的介绍。

一、策力读书社的建立

鹤庆地处云南西北边境，地理位置的边远偏僻和交通的阻滞，使鹤庆长期处于信息不灵、与外地交流甚少的闭塞状态。1936年4月21日——26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路过鹤庆，在鹤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团结抗日主张，号召人民奋起革命，用人民的力量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使鹤庆人民特别是青年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看到了中国的前途。红军的到来，在鹤庆有志报国的人们心中激起了汹

涌波涛,有的人参加了红军,与二·六军团战士一道北上抗日;一些青年则向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中国共产党,追随中国共产党的热望。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宣传抗战的书刊通过邮局和由外地回乡的人士零星带回鹤庆。1939年春,具有进步思想,想在新文化方面开创一点事业的段健石由保山返回鹤庆,带回八、九百册书籍。其中大多是苏联作品,中国左翼联盟作家的作品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又乐意将其藏书借给渴望进步青年阅读,产生了较大的作用。

段健石是县城西门街人,读过鹤庆乡村简易师范,毕业后随姑父到保山,经王樵林介绍到保山华西小学教书。王樵林思想先进,后来被保山国民党县党部以“异党”罪枪决。段与他交往,有可能在思想上受其影响。段健石业余喜好买书、读书,以致成为中学教员。他又与早年参加革命的鹤庆老乡黄洛峰有联系,能从黄洛峰负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现在的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昆明分社邮购书籍。读书生活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单位,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据点(八十年代,中央规定:参加三联书店即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工作的时间,即是参加革命的时间),所以,段健石从读书生活出版社购进的书籍,多为

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他常说：“天下第一乐事是闭门读禁书”。当时所说的“禁书”，是指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而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的书。他本人深受革命书籍影响，又愿意用这些书籍去影响青年人，所以给当时处于闭塞、沉闷状态的鹤庆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时鹤庆小学是春季始业，而初中是秋季招生，由小学毕业到考入中学，有半年间隔时间。在这期间，许多小学毕业生都要进各种各样的补习班。1939年春，刚从小学毕业的王燮元、李凤羽（一凡）、潘金华等七、八个同学，经甸南腰江的杨秀煜同学介绍，请段健石在他家里办了个小型补习班。

段健石对补习班学生的教育由两方面构成：一是讲课；二是借阅图书。讲课只有两个多月，讲的是文学课，所讲的文章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阿Q正传》，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杂感和郭沫若的诗以及《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同时还讲作家作品介绍，中国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汉、白薇、蒋光慈、沈从文；外国的从荷马到左拉、高尔基、果戈理。想看 he 介绍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他都有，可以借阅。他的书多是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有的版本今天看来很珍贵，如鲁迅作品是道林纸毛边本，《胡适文存》、《独秀文存》、《中国新文学大系》等是第一版。以个人的爱好从他那里也可以借到政治理论方面的书。

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些人在默默地进行着传播新

文化的工作，如小学教师张友樵，他得到刊登于杂志上的曹禺的《雷雨》，兴奋不已，看完的第二天，就在他授课的补习班上全部朗读给学生听。受他们的影响，有不少学生对革命文学作品产生热爱。

补习班学生考入初中以后，便酝酿成立一个读书合作社似的团体，即大家凑钱订阅书报杂志，并把自己的书拼凑起来共同阅读。1939年秋，读书社正式成立，叫策力读书社。社名是段健石取的，寓群策群力之意。第一批成员有王燮元、潘金华、李凤羽、杨知勇、杨远基（实）、杨云鹤、杨秀煜、芮丕铨、闵尔骞、张忍清、李炳暄等人。段健石做读书社的指导。段健石提出由杨知勇为社长，杨秀煜为副社长。提杨知勇为社长的原因是他比其他同学高一个学年，另一个原因是杨的父亲杨丽三于1903年在缅甸参加同盟会又是旅缅华侨会会长，当时是有名望的绅士，可以此作保护。大家同意了段健石的意见。社长是名义的，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起领导作用。策力读书社没什么章程，说它是一个小小的松散的群体也未始不可。我们大家有着共同追求进步的朴素感情，彼此交换借阅图书，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这个群体赖以互相联系的纽带便是图书与友谊。以书交友，犹如遇到知音，使读书社成员突破了原来的在段健石家办的小型补习班的范围。虽读书社实际上只有一年的生命，但这个青年群体的精神却一直被继承了五、六年，直到临近解放的李慈、鲍适矩、曹之清等。

二、策力读书社

策力读书社的初期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互相鼓励读书，交流学习心得。当时社员凑的书先存放于闵尔騫、潘金华、杨汝林家里，大家经常到他们家里交换书籍，并不拘形式的交流学习心得。段健石还利用他在民众教育馆工作之便，定期在民众教育馆讲课，讲课的内容多半为分析作品，介绍作家。讲课中还对鹤庆县长及一些上层人物评击，对社员起到培育反叛心理的作用。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些活动也给社员的读书提供了有利条件，他曾在中山公园内志舟亭下层办了一个“健秀图书室”（“健秀”用他本人及其妻马秀英之名，各取一字而成）。中山公园在今县人民政府后面，是当时城内的唯一游览胜地，在公园设立图书室，影响颇大。图书室由策力社成员李一凡、杨汝林、王燮元住守。随着日寇的铁蹄侵入，图书室还陈列出《日寇暴行录》画报及鹤庆收发的每日电讯、云南日报等，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段健石又在云鹤楼下东侧，租铺面开了个“大众书店”，出售当时出版的新书，其中赫然在目的有香港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本第一版（平装五册），此外尚有社会科学和文学书多种，几乎都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籍。有些书则是在书店和家里秘密出售，如莫斯科外文局出版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印象记》。这类书只卖给策力读书社的熟人，如芮丕铨就买到一本斯诺著的《西行漫记》，此

书大家争着看，轮不过来就拆成几本传看。这些书，满足了县城小青年向往革命，追求进步的知识饥渴。

与此同时，东门街李松泉家运来一批新书，开了个为时两个月的书店，其中有许多是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徐冰译的《共产党宣言》。书店的寿命虽然只有二个月，卖出的书籍却长期发挥作用，并促使策力社成员学习兴趣逐渐由文学转向社会科学。

宣伯超任鹤庆县中校长后，注意到杨知勇等人的学习爱好，派杨知勇、杨实、蒋秉枢三人负责县中图书室，晚上亦住宿于图书室，这也给策力社员提供了学习的方便。

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段健石利用民众教育馆职员的身份组织策力社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曾在财神殿演了一次抗日短剧，在金墩街赶集时搞了一次街头演讲，演讲内容主要是揭露日寇暴行和抗日救亡的伟大意义。还张贴“团结抗日”，“抗战到底”等标语，这是针对蒋介石的分裂活动及妥协政策写的。这时期，还有一些鹤庆师范和鹤庆县中学生也在街头进行宣传，如鹤师学生唐仿寅（唐兴全）即在大街上作街头宣传。策力社成员总是其中比较积极和活跃的力量。

三、秘密传播革命材料。段健石通过秘密渠道得到当时仍为禁书的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的书名

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给策力社的成员每人分赠了一本。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该书,不仅明确了奋斗方向,而且开始产生了寻求革命组织,追随革命政党奋斗的朦胧意识。大家感到,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的范围应该突破策力读书社成员的范围,乃悄悄传给周围要好的同学看。如果说,策力读书社成立之时还只是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学习组织,那么在这时候已开始发展为一个具有政治倾向,开始自发地采取革命行动的组织了。为了将来参加革命有较好的体质,大家还在夜里到黄龙潭洗澡,长途跑步到龙华山,搞饥饿爬山锻炼。

三、革命活动的扩展和延伸

策力读书社革命活动的扩展和延伸,有多方面的因素,最根本的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和影响迅速扩大;其次是共产党员和具有革命思想的教师的直接哺育和培养,其活动范围也逐渐超出鹤庆县范围。

宣伯超自 1944 年担任鹤庆县中校长后,在引导学生学习革命文艺和社会科学理论,宣传抗日救亡,传播革命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热爱文学,潜心于文学创作。他喜欢钻研哲学,对柏拉图、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有一定研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热爱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他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进步,具有教人不厌,诲人不倦,以学生进步为乐的广阔胸襟。策力社成员大都是鹤庆县中学生,这个群体没有以策力

读书社的名义在县中开展活动，但群体特征十分明显。宣伯超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一些特殊表现，如酷爱看书，所看书籍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思想活跃，善于探讨新问题，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彼此过从甚密等等。他喜爱这个群体的成员，把他们作为培养的主要对象，利用他的条件默默地给以扶持。前面谈到的让杨知勇、杨实、蒋秉枢管理图书室就是一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家里给策力社的部分成员补习英文，名义上是补习英文，实际是在思想上重点培养，英文课一般只上一个小时，然后就聊天，从文学、社会科学至国家前途都谈。当时芮丕铨和王燮元正集中精力钻研政治经济学，薛暮桥的、沈志远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读本都看了，常常提出些问题向他请教。如“平均利润”问题，“超利润”问题，“绝对地租”问题等都特别讨论过。他在讨论时常把他的藏书找出几本来供大家参考。曾把博洽德（德国人）的《通俗资本论》找出来给芮和王看，并告诫不要只顾理论，不联系实际，加深理论认识的最好方法是读历史。英语学习班的最后一个早上在沉痛的氛围中结束的，这天没讲课，大家一到场，宣伯超就叙述了皖南事变的情况，很为国家前途担忧。大家从此看到了国内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离开的时候，每个人都感觉到似乎脱了一层毛，天真幼稚的气息扫去很多，似乎一下子变得成熟起来。

宣伯超鼓励学生出壁报，策力社群体成为出壁报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出不够味，还弄到校外去。因为其

中有一些是针对蒋介石提倡的目的在于扼制进步思潮的文章,还有一些反对“国粹”的文章。一位当过乡绅后来当乡长的国文教员范××把贴在一块木板上的壁报扛到校长室去告状抗议。范某是跛子,扛起木板走路的姿势引得叛逆学生们哄堂大笑。宣伯超用蔡元培主张的思想开放回答范某,使得范某无话可说。但此后也出现了个别旧派学生出壁报和公开信与新派学生辩论的情况。

边城缺乏质量好的教师,且又处于闭塞状态,因此,只要有会,这一群体就要想办法了解外面的情况。宣伯超的好友范义田来看他,范的学术造诣较高,大家就要求请范来演讲,范到学校讲了一次,题目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期问题”表述的很清楚生动,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宣伯超又以学校的名义进行了社会宣传活动,组织学生演出了两个大戏:吴祖光的《凤凰城》和于伶的《夜光杯》。前者是自排自演,后一个剧是请他在昆明的老朋友,国立剧专毕业的范启新来导演。这期间,又请范启新给这一群小青年讲了两三次戏剧知识,从古希腊的园形剧场讲到易卜生的第四面墙的午台镜框;又通过果戈里的喜剧《结婚》,分析了戏剧冲突的结构形态。宣的目的是使青年人多有一种从事社会活动的本领。

在上述活动中,策力读书社的成员有了发展,先后有周一聊(周嘉惠)、杨帮基、舒彬(舒涟玉)、吕冰(吕秀珍)、蒋锡彬、品毓仙、杨琼芝、曹成基(曹树新)、彭懋勋、蒋秉枢、杨廉(杨汝芮)、苏盛、李凤麟、华玉昆、李永茂、毛锦熙

等加入进来,当时虽没有以策力社名义出现,但各种活动都以策力社成员为核心,群体特征很明显。

那时候,唐仿寅、余嘉乐、刘瑞民等人也喜欢读进步书籍,热心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但他们是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群体,所以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不如策力社明显。

1941年秋,杨知勇、蒋锡彬到丽江市立中学读高中。一年以后,王燮元、李逸凡、张忍清、杨汝林、芮丕铨等人也到丽江中学读书,策力社的活动也就分成丽江中学和鹤庆中学两个阵地。

丽江中学的情况与鹤庆中学的情况迥然相异。1941年秋季以前,刘云中(刘世鹤)还未到该校任教,在教师中影响较大的是思想比较反动的王金钟等人。他们公开攻击苏联,攻击中国共产党,以致在鹤庆中学曾经受过进步影响,读过些革命书籍,于1940年秋季进入丽江中学的少数几个学生表示“幡然醒悟”,将原来购置的革命书籍烧毁。但丽江中学也还存在另外一个有利条件,1941年进校的学生中,有寇慎(赵国华)、王祖鑫、杨鹏翥等剑川学生,他们曾受剑川籍共产党员张子斋、欧根、王以中等人的影响,具有革命倾向。共同的革命倾向使杨知勇、蒋锡彬与剑川来的寇、王、杨等人很快的结合起来,在杨知勇的倡议下成立了读书会,由杨知勇任会长。这个读书会实际是策力读书社的分社。

1941年到校的教师刘云中,曾到过延安,进过抗日军政大学,是1939年入党的党员,由党组织派到丽江发